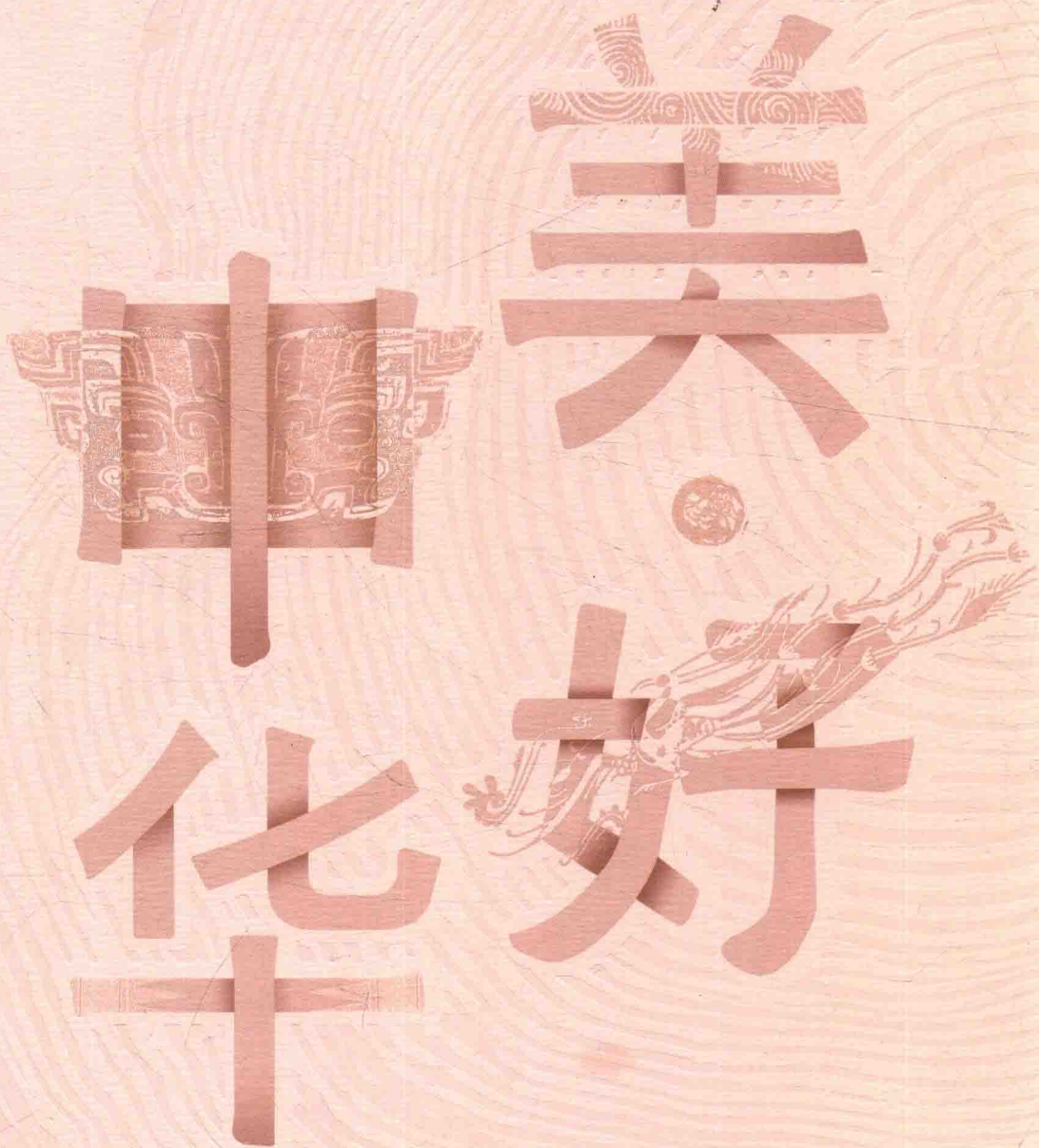


SPLENDOR AND BEAUT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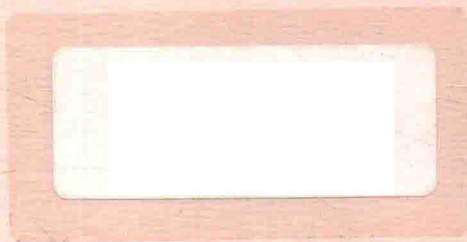
The Archaeological
Finds in Recent 20 Years in China

首都博物馆
编

美·好·中华
近二十年考古成果展



文物出版社



首都博物馆
CAPITAL MUSEUM, CHINA

上架建议：文物 / 考古

ISBN 978-7-5010-5137-3



文物出版社官方微信



定价：360.00 元

SPLENDOR AND BEAUTY

The Archaeological
Finds in Recent 20 Years in China

首都博物馆
编

近二十年考古成果展

美 · 好 · 中华

 文物出版社

首都博物馆 书库

丁种 第肆拾壹部

《美·好·中华——近二十年考古成果展》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美·好·中华:近二十年考古成果展/首都博物馆

编.--北京:文物出版社,2017.8

ISBN 978-7-5010-5137-3

I.①美… II.①首… III.①文物—考古发现—中国—图录 IV.①K870.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55525号

美·好·中华

——近二十年考古成果展

编 著:首都博物馆

撰 文:冯 好 俞嘉馨 张 杰 龙霄飞 黄春和

裴亚静 张全礼 刘 丞

英文翻译:杨丽明 邵欣欣 张继华 赵雅卓

责任编辑:智 朴

特约编辑:李吉光

责任印制:梁秋卉

出版发行:文物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东直门内北小街2号楼

邮 编:100007

网 址:www.wenwu.com

邮 箱:web@wenwu.com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雅昌艺术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635mm×965mm 1/16

印 张:21.5

版 次:2017年8月第1版

印 次:2017年8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010-5137-3

定 价:360.00元

本书版权独家所有,非经授权,不得复制翻印

主办单位

国家文物局 北京市人民政府

协办单位

北京市文物局

承办单位

中国文物交流中心 首都博物馆

支持单位

山西省文物局 河北省文物局 辽宁省文物局 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厅（文物局） 江苏省文物局
浙江省文物局 安徽省文物局 江西省文化厅 山东省文物局 河南省文物局 湖北省文物局
湖南省文物局 广东省文物局 四川省文物局 贵州省文物局 云南省文物局 陕西省文物局
甘肃省文物局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局

参展单位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首都博物馆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山西博物院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南京博物院 南京市博物总馆
扬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浙江省博物馆 桐乡市博物馆 安吉县博物馆
良渚博物院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临沂市博物馆 济南市长清区博物馆 沂源县文物管理所 青州博物馆
新泰市博物馆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河南博物院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 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
新安县博物馆 偃师商城博物馆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湖北省博物馆 荆州博物馆
随州市博物馆 蕲春县博物馆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广东省博物馆
成都博物馆 金沙遗址博物馆 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遵义博物馆 云南省博物馆
云南李家山青铜器博物馆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 秦始皇帝陵博物院
宝鸡青铜器博物馆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甘肃省博物馆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

展览项目组

展览策划：关强 舒小峰

展览主持：王军 白杰

展览统筹：韩战明 杨文英 赵古山

展览责任人：龙霄飞 杨焯

展览内容设计：冯好 俞嘉馨 戴鹏伦

展览形式设计：李丹丹 李赫

文物筹备：赵古山 钱卫 靳非 龙霄飞 戴鹏伦 钟梅 李健

李天凯 刘杰 盛夏 刘家朋 任杰 徐赫 张钊

张易婷 王卓然 王海燕 彭湘炜 李光远 朴识 罗征

文物说明：冯好 俞嘉馨 张杰 龙霄飞 黄春和 裴亚静 张全礼 刘丞

布展：索经令 李健 胡昱 戴鹏伦 李天凯 盛夏 刘杰 王卓然

于力凡 闫娟 李光远 陈思 钱成 徐亮 王磊 徐涛 王俊

摄影：梁刚 谷中秀 张京虎 罗征 朴识

宣传推广：杨玉莲 杨丹丹 曹秋月 罗丹 袁玥

图片提供：首都博物馆 南京博物院 南京市博物总馆 扬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临沂市博物馆 青州博物馆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湖北省博物馆 荆州博物馆 随州市博物馆 陕西历史博物馆

致 辞

2017年5月18日，为做好国际博物馆日的宣传活动，展示近二十年我国的考古成果，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国家文物局、北京市人民政府主办，北京市文物局协办，中国文物交流中心、首都博物馆承办的“美·好·中华——近二十年考古成果展”在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幕，这既是广大文物考古工作者向社会的一次集中汇报，也是为广大市民精心准备的一道文化大餐。

中国传统美学蕴含着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精华，回望中华民族美学长廊，美的足迹总是与历史印记亦步亦趋，美的历程也是历史轨迹的折射。五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不同民族的文化互相影响，相互交融，形成了兼容并蓄、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不同历史时期所遗留下的精美文物，则代表着这个时期对“美”的认知。随着考古学的发展，更多文物的出现，人们对于文明的认识也在不断加深，可以说考古是一个证经补史的过程，也是不断发现“美”“好”的过程。

“美·好·中华——近二十年考古成果展”，汇集了20个省（区、市）的考古所、博物馆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共52家单位近400件文物珍品，以时代为轴、以美学和哲学为线，从古人对美的认识、对美的发现、对美的创造出发，诠释物化在文物上的中华传统美学思想，揭示美学现象背后蕴含的中华文明发展规律。

希望观众在展览的参观体验中，加深对文物考古领域的认知，体味考古之美、文物之美、中华之美，进而深化对中华文明的理解与认同，推动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促进传统文化与当代文化相融相通，共同服务以文化人的时代任务。

祝“美·好·中华——近二十年考古成果展”取得圆满成功。

国家文物局局长 刘玉珠

致 辞

1990年至1995年，国家文物局曾于故宫博物院、中国历史博物馆（现中国国家博物馆）等地四次举办“中国文物精华展”，公开展出了当时全国范围的重要考古文物，在社会引起了良好反响。1996年至今，随着行业理念的进步、学术水平的提高及科学技术的发展，考古行业取得了巨大的发展进步。这二十年间，从雷峰塔地宫、到海昏侯遗址，从新疆精绝古城的尼雅遗址、南海一号沉船，到扬州隋炀帝墓，众多重要遗址被发现、研究，其中许多精美文物从未与观众见面。

缘于上述众多契机，受国家文物局和北京市人民政府委托，由北京市文物局协办，中国文物交流中心与首都博物馆承办了“美·好·中华——近二十年考古成果展”。展览汇集了20个省（区、市）的52家文博单位的近400件藏品，展示近二十年来全国考古发掘的重要成果，通过这些珍贵的展品，向观众传达中国古代审美、工艺、历史等文明脉络。

社会上有很多朋友对于考古学也许有些疑问，考古的意义是什么。是探寻价值连城的金银宝藏？还是挖掘供今人鉴赏的杯盏文玩？抑或是填充博物馆的藏品作为历史课本的实物补遗？其实考古的意义并不在文物本身，而在于古物背后的文化意义甚至于人类文明的解读和传续。希望展览带给观众视觉享受和知识收获的同时，可以引起社会对于考古和中国文化的些许思考与共鸣。

中国文物交流中心主任 王军

致 辞

2014年2月26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市视察工作时指出：“北京是世界著名古都，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是一张金名片，传承保护好这份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是首都的职责。”如何更好保护利用好首都的“金名片”？通过几年的摸索，结合多年来文物工作经验，北京市文物局倡导整合各方面优势，不单打独斗，尤其是展览工作，以合作办展的方式，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我搭台你唱戏”。

2016年春季，“五色炫曜——南昌汉代海昏侯国考古成果展”、“王后·母亲·女将——纪念殷墟妇好墓考古发掘四十周年特展”双双走入首都博物馆，吸引了无数观众的眼光，也成了2016年文博领域一大热点事件。考古发掘将久远的过去鲜活地呈现于眼前，因而考古学在诞生后的200年里颠覆性地刷新着人们对历史和世界的认识。如果说海昏侯和妇好两展是集一时一墓之精绝，那么本次“美·好·中华——近二十年考古成果展”，则集纳了来自全国20个省市自治区、52家文博机构的近400组件出土文物，尝试以“美的发展”为视角，以中国历史发展为序列，以出土文物为物证，揭示中国传统审美观念的兼容并蓄，多元共存，各美其美，美美与共，诠释美学现象背后蕴含的文化认同、国家认同、民族认同。

作为文化中心，通过每一次展览，摸索如何盘活文物资源，更好地丰富市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在这条路上，北京市做了不少探索。我们利用地利，联合同行，调动各方积极性，实现共赢。此次“美·好·中华——近二十年考古成果展”选取平易近人的展览视角，着眼于近二十年的考古成果，希望通过首都博物馆的平台，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以展览的方式反映中华文明历经五千多年的发展，创造的光辉灿烂的历史文化，丰富多彩的文化遗产，践行“讲好中国故事”也是我局所倡导的借助各文博兄弟单位的精彩文物，北京的地理优势，我们搭台，大家唱戏的又一次实践。

博物馆作为文化建设与文明宣传的窗口，肩负着“让文物活起来”的历史责任。展览策划工作不断推陈出新，在展览主题的研讨方面更深入挖掘，是北京市文物局对首都博物馆展览工作的要求。希望本次展览能够为广大市民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为首都文化事业增添光彩。

内容策划

考古展对于社会公众有着异乎寻常的吸引力，这缘于考古学与人的天性有着共鸣。一方面考古学能够形象地揭示古代状况，告诉人们“我从哪里来”；另一方面考古学研究古人的生活，令观众感到“与我有关”。

博物馆也研究人——观众。首都博物馆新馆自开馆以来，已举办了二百余项展览，大量的展览实践使我们对观众的研究得以不断深入。近年的观众问卷调查表明，超过四成观众对传统的中国文物展览已产生了审美疲劳，这促使我们对展览的解读方式求新求变。

这次我们仍然从人的天性入手。观众对于文物会本能地产生审美反应，那展览就以中国传统审美观作为切入点，帮助观众提高欣赏文物的能力，进而从审美的角度了解中华文明。设定这一主题也是源自博物馆教育本就包含美育，这恰是我国学校教育的薄弱环节，需要第二课堂来弥补。

要知其然，须知其所以然。帮观众厘清中国古代数万年审美发展历程是展览的手段，最终目的是要从审美这一观众最容易认同的角度揭示中华传统文化的文明基因，增强大众的文化自信。因此，展览的叙事结构以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为主干，将审美还原到哲学中，由因（美学原因）导果（美学现象）、执果索因，在中国历史发展的大背景下向观众呈现中华文明的美学轨迹。标题“美·好·中华”即表现了从中国传统哲学对“美”的定义向中华传统文化根脉递升的逻辑思辨，开宗明义彰显展览主题与宗旨。

诚然，要用近二十年考古发掘的物化成果支撑这样的主题和叙事语言，难免会碰到“证据链”不足的问题，探索的成果总是有两面性。本展览之于我们最主要的创新在于：它为大众开启了一扇鉴赏艺术、感受文化的新窗——传统并不晦涩，古典并不遥远。

首都博物馆 冯好

目 录

- 002 历史考古学重在何为 / 白云翔
- 014 “美·好·中华——近二十年考古成果展”
空间氛围设计对展览主题的表现 / 李丹丹
- 025 顺应、打破与重建
——谈“美·好·中华——近二十年考古成果展”内容设计的新尝试 / 俞嘉馨
- 031 前言
- 033 一 道法自然(史前时期)
- 059 二 天地之道(夏商周)
- 060 (一) 制礼作乐
- 156 (二) 依类象形
- 169 三 保合太和(汉唐)
- 170 (一) 和乐且湛
- 242 (二) 悲愿无尽
- 257 四 和合能谐(宋元明清)
- 258 (一) 天真笔意
- 286 (二) 以和为贵
- 318 (三) 万里云帆
- 325 结语
- 327 遗址照片
- 334 后记

目 录

- 002 历史考古学重在何为 / 白云翔
- 014 “美·好·中华——近二十年考古成果展”
空间氛围设计对展览主题的表现 / 李丹丹
- 025 顺应、打破与重建
——谈“美·好·中华——近二十年考古成果展”内容设计的新尝试 / 俞嘉馨
- 031 前言
- 033 一 道法自然 (史前时期)
- 059 二 天地之道 (夏商周)
- 060 (一) 制礼作乐
- 156 (二) 依类象形
- 169 三 保合太和 (汉唐)
- 170 (一) 和乐且湛
- 242 (二) 悲愿无尽
- 257 四 和合能谐 (宋元明清)
- 258 (一) 天真笔意
- 286 (二) 以和为贵
- 318 (三) 万里云帆
- 325 结语
- 327 遗址照片
- 334 后记

历史考古学重在何为

◎ 白云翔（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历史考古学”，又称之为“历史时期考古学”，是考古学的基本分支学科之一。

夏鼐先生等指出：关于考古学的分支，“从研究的年代上划分，考古学可分为史前考古学和历史考古学两大分支。也有人主张在两者之间加入原史考古学而成为三大分支，但从实际意义来说，原史考古学的重要性不如前两者。史前考古学的研究范围是未有文字之前的人类历史，历史考古学的研究范围则限于有了文献记载以后的人类历史，两者的界线在于文字的发明”^[1]。就中国考古学来说，关于历史考古学的年代上限，如果考虑到夏代是第一个有文献记载的古代王朝，而夏代建立于公元前 21 世纪^[2]，那么，可以划定在夏王朝建立的公元前 21 世纪；但是，如果考虑到我国古代成熟的文字系统和文字制度目前可以上溯到殷商时期^[3]，那么，则可以划定在盘庚迁殷的公元前 1300 年左右。从考古学和历史学两方面综合考虑，笔者以为我国历史考古学的年代上限划定在夏王朝建立的公元前 21 世纪为宜。当然，公元前 21 世纪～前 11 世纪的夏商时期乃至公元前 11 世纪～前 771 年的西周时期的考古学更多地具有原史考古学的性质和特点，因此，本文所论更多的是就东周以后的历史考古学而言。

关于历史考古学的任务和特点，夏鼐先生等也曾指出：史前考古学和历史考古学的基本属性、研究对象和最终目标是相同的，但“两者的研究任务也有所不同。史前考古学承担了究明史前时代人类历史的全部责任，而历史考古学则可以与历史学分工合作，相辅相成，共同究明历史时代人类社会的历史”^[4]。基于上述论断并结合我国古代文献的特点、笔者

[1] 夏鼐、王仲殊：《考古学》，《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16 页。

[2] 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夏商周断代工程 1996～2000 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00 年版，第 74—82 页。

[3] 夏鼐：《中国文明的起源》，文物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85—87 页。

[4] 夏鼐、王仲殊：《考古学》，《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17 页。按：这里的“历史学”是指狭义的历史学，即“文献史学”。

对历史考古学的思考和实践，我们曾经指出：“历史考古学相对于史前考古学而言，具有两个最鲜明的特征：其一，是必须与文献记载相结合；其二，是主要任务和研究的重点发生转移，即转移到物质文化的研究、精神文化的物化研究和社会生活的具象化、实证化研究”^[1]。从文明史的角度讲，这里的“物质文化”即“物质文明”，“精神文化”即“精神文明”。

近二十年来，我国的考古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形成了新的时代特色。其变化之一是“田野考古领域进一步扩展，考古发现更为丰富多彩。田野考古在时间上的扩展，不仅表现在对‘古不考三代以下’观念的彻底摒弃，而且表现在对明清时期田野考古的重视和实施，顺应了世界考古学的发展趋势”^[2]。从全国田野考古的实践来看，每年的重要考古发现中，包括夏商周在内的历史时期的考古项目约占总数的三分之二左右，秦汉及其以后历史时期的考古项目也已经占据“半壁江山”。“考古学的发生和发展，始终是同考古发现相伴的”^[3]；“新材料出新学问”，随着历史时期田野考古的一系列新发现，历史考古学各方面的研究也进一步展开，并逐步深化。历史考古学在整个中国考古学乃至我国文化遗产事业中的地位和作用，正在日益凸显。这里采用“举例说明”的方式，结合近二十年来我国历史时期的田野考古发现，就历史考古学的主要任务和重点略作论述。

物质文明作为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体现社会生产力发展进步的物质成果，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条件。按照“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科学技术及其发展水平也属于广义上物质文明的范畴。它既是社会进步的最根本的因素，也是一个社会发展水平的“指示器”，更是人类社会得以存在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它涉及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大到一座城市、小到一件物品都有所反映和体现。作为根据实物资料和信息研究古代社会历史的考古学，在物质文明的研究上具有独特的优势。苏联十月革命以后，曾一度把“考古学”改称为“物质文化史”，并一度把考古研究机构改为“物质文化史研究所”，这无疑是对考古学性质和任务的曲解，但却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物质文明研究在考古学中的分量。

[1] 白云翔：《汉代临淄铸镜业的考古学考察》，《探古求原》，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36页。

[2] 白云翔、施劲松：《新世纪中国考古新发现（2001～2010）述评》，《新世纪中国考古新发现（2001～2010）》，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63页。

[3] 白云翔：《20世纪中国考古发现述评》，《二十世纪中国百项考古大发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页。



图1. 西安汉长安城厨城门1号桥（北→南）

近二十年来历史时期的田野考古，使得物质文明研究取得长足进展。其中，既包括以手工业为主要内容的社会生产研究，也包括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物质条件的研究。

桥梁，作为重要的交通设施，是古代人们跨越河流的主要途径之一，桥梁建设水平是物质文明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2012年以来，在西安汉长安城以北和东北的古渭河上先后探明古代桥梁遗存三组，共7座。其中，位于汉长安城厨城门外1200米处的厨城门1号桥（图1），发掘清理出大量木桥桩，桥桩间距3~7米不等，残高5.2~6.6米，东西两侧桥桩之间宽15.4米，南北桥长约880米，同时还发现大量长方形、方形、五边形和梯形的石构件，其年代为汉魏时期^[1]。据此复原，厨城门1号桥是汉魏时期渭河上一座长800米以上、宽15米左右の木梁柱结构的大型木石构桥梁，真实地再现了2000年前我国古代桥梁的结构、规模和建造技术水平。

瓷器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成就之一。早在公元前16世纪的商代前期，原始瓷器就已经出现，到东汉时期烧制成功了真正的瓷器。魏晋以后的瓷器烧造业作为当时规模最大的手工业，不仅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发挥着支柱作用，而且与人们的日常生活紧密相关，还是宋

[1]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西安市汉长安城北渭桥遗址》，《考古》2014年第7期

元明时期重要的对外贸易商品，是当时物质文明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瓷器烧造业的考古发掘和研究，是手工业考古中历史最久、用力最多、成果最为丰硕的一个领域，历代瓷窑址的调查和发掘几乎年年都有，重要的发现接连不断。譬如，浙江东苕溪中游商代原始瓷窑址群、福建永春苦寨坑有别于浙江原始青瓷技术体系的夏商时期的原始青瓷窑址、浙江德清火烧山西周晚期至春秋晚期的原始瓷窑址以及亭子桥战国时期的原始青瓷窑址的发掘；浙江上虞禁山东汉至西晋时期的早期越窑青瓷遗址、上虞尼姑婆山三国孙吴至西晋时期的青瓷窑址的发掘；作为晚唐和五代时期秘色瓷和宫廷用瓷主要产地的浙江慈溪上林湖后司岙秘色瓷窑址、杭州市上城区与南宋修内司官窑有关的老虎洞窑址、浙江龙泉与宋代“哥窑”有关的黑胎青瓷窑址的调查与发掘；长沙铜官窑遗址晚唐五代至明代遗迹的发掘；江西景德镇地区唐宋至明清时期多处瓷窑址的连续多年的调查和发掘；安徽繁昌五代至宋代的青白瓷窑址的发掘；河南禹州神垕镇唐代至元代钧窑址、禹州闵庄宋元明时期的钧窑址、巩义唐代烧制青花瓷、唐三彩以及白瓷的黄冶窑址和白河窑址的发掘；河北曲阳唐至元代定窑遗址的发掘；山西河津固镇宋金瓷窑址的发现和发掘等。这些瓷窑址的发掘及相关研究，都进一步深化了我国瓷器起源、制瓷技术演进及历代制瓷业生产的研究。

造纸术是我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之一，魏晋以后逐渐成为一个独立的产业。2005 ~ 2008年江西高安华林宋元明时期造纸作坊遗址的调查和发掘，先后在周岭村和西溪村清理14座水碓，并在周岭村和福纸庙等地清理出沤竹麻塘、抄纸坊、拌灰与发酵的工作台、石灰堆、烧碱坑、尾砂坑等遗迹，以及引水管的痕迹，结合《天工开物》等有关古代造纸的记载，基本复原了当时从伐竹到沤料、煮料、腌料、舂料、配药制浆直至抄造成纸的一整套以竹子为原料造纸的工艺流程及造纸作坊^[1]。类似的宋代造纸作坊遗址，在浙江富阳泗州也有发现，并且其工艺技术大致相同^[2]。

实际上，随着田野考古新发现的不断增多和内涵的逐步丰富，历史时期物质文明研究的各个方面都在不断进展。譬如，安阳洹北商城的发现和历代都城、地方性城邑遗址的田野考古，进一步丰富了对历代城市建设及其功能和风貌的认识；江苏张家港唐宋时期的黄泗浦港口性集镇遗址、上海青浦唐宋时期青龙镇遗址的发掘等，极大地推进了市镇的研究；安阳殷墟、周原李家村等商周青铜冶铸作坊址，临淄齐故城汉代铸镜作坊址，章丘东平陵城、陕西杨凌

[1]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江西高安市华林造纸作坊遗址发掘简报》，《考古》2010年第8期。

[2] 杭州市文物考古所等：《富阳泗州宋代造纸遗址》，文物出版社2012年版。

郃城等汉代制铁工场址，北京延庆大庄科辽代矿冶遗址群的调查和发掘等，极大地促进了我国古代青铜和钢铁技术以及青铜冶铸业和铁器工业的研究；甘肃肃北马鬃山玉矿遗址连续多年的调查和发掘，揭示了先秦至汉代玉矿的开采状况；1999年在成都平原周边地区及渝东至三峡全境开展盐业考古以来，商周至唐宋时期的盐业考古，在渤海湾南岸等地广泛展开，极大地深化了关于古代制盐技术和盐业生产的认识；凤翔雍城豆腐村战国时期陶建筑材料烧造作坊、陕西富平桑园大型唐代官办砖瓦窑场等的发掘，深化了砖瓦烧造技术及烧造业的研究；从1999年成都水井坊明代酿酒作坊遗址的发掘到后来江西进贤县李渡元明清时期的烧酒作坊遗址、四川宜宾喜捷镇槽坊头明代酿酒作坊遗址和绵竹剑南春“天益老号”清末民初酒坊遗址等的发掘，初步揭示了元代以来的酿酒工艺技术及生产水平；重庆忠县临江二队明代炼锌遗址、湖南桂阳桐木岭明清时期以炼锌为主兼及其他金属冶炼遗址的发掘，使得我国古代炼锌技术起源和炼锌业发展的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这些历史时期物质文明的考古发现及其研究成果，为今后历史考古学中的物质文明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开辟了新的道路。

三

精神文明是相对于物质文明而言的。它作为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的、体现社会发展进步的精神成果，包括思想、文化、道德、教育、科学和艺术等，是人们社会关系、思想意识、道德观念、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精神生活的总的概括。从广义上说，所谓的“政治文明”、“制度文明”和“社会组织”等，实际上也属于精神文明的范畴。当然，古代人们的精神生活和精神世界已经随着时间的脚步而消失，但它们不仅被历史文献所记述，而且在人类活动所遗留的各种遗迹和遗物上打上了深深的精神活动的烙印，以各种物质的形式为载体保留了下来，从而使得从考古学上根据实物资料对其进行物化研究成为可能。尽管根据考古学的实物资料研究精神文明不像研究物质文明那样直接、那样具体，但通过对考古学实物资料的科学解读和阐释，是完全可以做到的，而且是整个考古学研究的题中应有之意。正因为如此，俞伟超先生早在二十多年前就呼吁：我国的广大考古工作者，应当“多花些精力来研究考古资料包含的古代精神活动方面的问题”^[1]。

[1] 俞伟超：《考古学研究中探索精神领域活动的问题》，《考古学是什么——俞伟超考古学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42页。按：该文最初发表于1989年《文物研究》第5期。